

【著作者说】

适趣闲文《红楼梦》

□马瑞芳

《红楼梦》的伟大之处,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学意义,更在于它写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,生老病死,友谊爱情,富贵贫困,这是每个国家,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碰到的。英国小说理论家佛斯特认为,小说无非写人生五大事件,出生、饮食、睡眠、爱情、死亡。马瑞芳教授研究《红楼梦》五十多年,写过不少相关著作,这一次,她最想用佛斯特的观点谈谈《红楼梦》。



《马瑞芳品读红楼梦》
马瑞芳 著
江西人民出版社

1980年,我给六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讲《红楼梦》,讲到王熙凤,我往黑板上写个“蛇蝎美人”。瑞典留学生不干了,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。王熙凤很有能力,我如果娶妻子就娶王熙凤这样的。我很震惊,后来想想很有道理。这个学生离开中国不久,就做了瑞典王国驻香港总领事,又过了几年在帕尔梅首相手下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。这样有从政能力的欧洲青年为什么喜欢王熙凤?就因为像小品里说的,王熙凤你太有才了。秦可卿死了,宁国府乱成一锅粥,王熙凤几天时间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我给日本学生讲到王熙凤,日本学生说,我们日本人打麻将,下属也得学王熙凤,故意输钱给上级。王熙凤有这么广泛的国际影响!

2008年我在布加勒斯特跟《红楼梦》罗马尼亚译本的译者一起吃饭,我问她:你为什么翻译《红楼梦》?她说了一句话,当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她说,《红楼梦》是我们欧洲文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。说得太好了!欧洲文化的高峰是莎士比亚,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创造四百多个人物,曹雪芹一部没写完,或者是写完没完全传下来的小说,也创造四百多个人物。其中两百多个女性,从贵族夫人贾母到农村老太太刘姥姥,从千金小姐林黛玉、薛宝钗,到粗使丫鬟傻大姐,一个一个活灵活现,好像能从纸上走下来。说《红楼梦》是欧洲文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,这句话太恰当了。

我印象最深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专家观点是什么呢?胡适是

新红学创始人,有很多红学著作,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,是1985年《胡适传》作者唐德刚先生到哈尔滨参加国际红学会的时候说的。唐先生在会上说,胡适当年不做驻美国大使了,就和我们一起去吹牛,说话比较随便,他说《红楼梦》不是好小说,没有主题。没有主题你为什么还研究《红楼梦》?胡适说,好玩呀。胡适是新红学鼻祖,我认为“好玩”在他所有的红学观点里面,是最重要、最精辟,也最到位的。

《红楼梦》为什么“好玩”?因为有趣,《红楼梦》充满情趣、谐趣,还有一般小说没有的雅趣。其实,将小说写得有趣,本来就是曹雪芹追求的。第一回写到空空道人和石头对话,石头(曹雪芹的化身)说:“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,爱适趣闲文者特多。”所谓“理治之书”就是关于治国理政之书,普通百姓闲暇时间,谁还再研究如何治理国家?都会找一些适合自己情趣、本身也特别有趣的书看,比如诗、词、美文、小说。曹雪芹就是以“适趣闲文”定位,完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。他还特别瞧不上两种似乎是适趣闲文的小小说,一类是风月笔墨,以淫秽污臭糟蹋文字坏人子弟;一类是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小说,满纸潘安、西子,不过假拟出男女二人姓名,再加一个小人拨乱其间。《红楼梦》也写儿女之情,写离合悲欢、兴衰际遇,但与这些小说截然不同,曹雪芹在第一回,就借空空道人与石头对话表达了自己创造《红楼梦》的美学理想和自视甚高的心理。脂砚斋说:

“开卷一篇立意,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,阅其笔,则是《庄子》《离骚》之亚。”

我研究《红楼梦》五十多年,第一篇红学论文是1962年大学三年级交的古文学作业《贾宝玉批判》。研究这么多年,写过不少书,现在最想用英国小说家兼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观点看看《红楼梦》。佛斯特认为,小说无非写人生五大事件,出生、饮食、睡眠、爱情、死亡。

写人的出生,世界上哪位小说家创造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缘定三生的大爱神话?贾宝玉前身是赤瑕官神瑛侍者,林黛玉前身是灵河岸边三生石畔一株绛珠仙草。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这株仙草,仙草得以活下来,修成仙女。她五衷之内,也就是内心深处一直感戴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。当神瑛侍者要下凡做贾宝玉的时候,绛珠仙子要跟他下去,还他的甘露之恩。把我一生的眼泪全还给他。在世界文学当中谁见过这样的相爱是为了还泪的神话?世界上哪位小说家写爱情,能写到像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这样,不是三角恋,但比三角恋要有趣得多,好看得多,因为他们三个人是聪慧者的心灵捉对厮杀,也是贾宝玉人生道路的选择。

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能写出像《红楼梦》里面的那些饮食?《红楼梦》的饮食,最有代表性的是茄鲞,我参加过很多国际红学会,吃过很多次的红楼宴,不管有多有名的大厨,都没做出王熙凤所说的茄鲞。后来87版《红楼梦》的民俗顾问邓云乡先生告诉我,你知道吗,茄鲞是什么,就是官爆鸡丁。不要说红楼宴的那

些大菜,红楼早点就能把外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我非常喜欢俄罗斯小说,特别是三位长篇小说大家——妥斯陀耶夫斯基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。这三位俄罗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家,他们几十部长篇小说加一块,对俄罗斯饮食的描写能和《红楼梦》比吗?根本就不能比,因为《红楼梦》写的是中国的饮食,《红楼梦》更写的是中国文化,餐饮桌上写文化。史大君两宴大观园,那是个多么有趣的宴会。

《红楼梦》的死亡被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艺术。秦可卿之死和《歧路灯》谭孝移之死,《金瓶梅》李瓶儿之死,是中国古代小说描写人物之死的三大经典,《红楼梦》写晴雯之死,晴雯和贾宝玉什么关系?“光谱纯”一样,太纯洁了,但当晴雯要离开人世时,把红指甲咬下来交给贾宝玉,把贴身衣服和贾宝玉换了,多么感人的生离死别。更有意思的是,《红楼梦》还把人物死亡和一个大家庭呼喇喇似大厦倾联系在一起,所以《红楼梦》太有趣了。

关于《红楼梦》最有趣的一句话是1992年扬州开国际红学会闭幕式上,蒋和森先生说的,他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,不可以没有《红楼梦》。这话过分吗?想想还有几分道理。我们现在生活匆忙,要跑多少地方,我们可以背上本《红楼梦》,到任何一个地方从任何一段打开就看,璀璨的龙文化气息扑面而来,人们的生离死别、生老病死、穷困富贵、人生感悟,都在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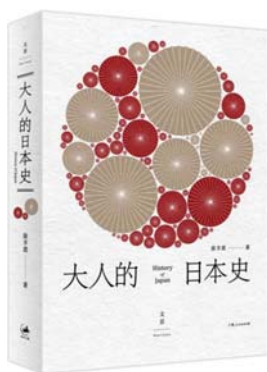
(本文摘自《马瑞芳品读红楼梦》序言)

【读史知今】

有趣有料的日本史

□刘柠

作为“通史”,《大人的日本史》聚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“3·11”巨震后逾四百年的历史,涂丰恩总结出“锁国、浮世、黑船、开国、铁路、东京摩登、电视、平成”等30个关键词,引领读者穿越四百年的路线图,发掘那些隐藏在在大历史褶皱中的细节。



《大人的日本史》
涂丰恩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近五六年,国内出版的日本史著作明显多了起来,仅笔者过眼者,就有不下十五种,有美国人的著作,日本人的著作,也有中国学者的著作。有些是大部头,甚至是多卷本,积年磨一剑——数载才出一卷(如《剑桥日本史》)。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中,笔者独钟那类作品:作者未必是研究日本史的专家,其书也不是写给历史系学生的教科书,但视界高远,史识宏阔,论证缜密,看似信手拈来的史料,实际上无不经挑选的拣选,像职人手里的手工似的,打磨得玲珑剔透,精致可人。反映在文本上,就是有料有趣,叙事生动,一气呵成,毫无阅读障碍。

在谈论日本历史时,国人常引以为傲的一点,是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记录,源于中国的史书《魏书·倭人传》,甚至比日本本土的“记纪神话”(即记述日本国起源的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)还早了五百年。然而,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。事实的另一面,是中国尽管对日本“知”之甚早,却浅尝辄止,“知”之不深。岂止是不深,长期以来,甚至陷入思考停滞,以一种面对“蕞尔小国”的高冷来拒斥了解,乃至酿成国人之知日与日人之知中的极度不均衡状况。

造成国人对日本隔膜的原因不少,我也并没有专门研究,但是,窃以为其中有一条,怕是很难否认,那就是:缺少关于日本历史的有趣读本。提到东瀛,国人至今对所谓“日本四书”津津乐道(即露丝·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、新渡户稻造的《武士道》、戴季陶的《日本论》和蒋百里的《日本人》),这也未免太过陈旧了。不是说“四书”不好,而是说带有相当的局限性——主要是时代的局限,而有些知识,也早已过了学术“赏味期”。以“四书”中公认最具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《日本论》来说,对军国主义的构造和成因,书中虽不乏精辟的论述,但作为1928年初版的著作,铸成军国主义失败的最大试炼——“二战”毕竟尚未爆发,“化学反应”尚未发生,戴季陶的某些结论现在看来也是难以站住脚的。

并非没有好的日本史著作,但一向缺乏学术性与公共性兼具、史识与史趣相融合的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大人的日本史》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。作为“通史”,这本书实际上是从近世写到今天,确切地说,是聚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“3·11”巨震后逾四百年的历史,在时间跨度上,基本与赫赫有名的史学著作、美国詹姆斯·L·麦克莱恩的《日本史

(1600—2000)》相当。如果说,对日本和世界而言,明治维新以降一个半世纪的历史,是一部“激荡的近代史”(权且借用吉田茂回忆录《激荡的百年史》的表述)的话,那么,包括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并跻身列强俱乐部的历史在内,其答案,或曰历史“规定性”,其实已经埋伏在更早的历史——即江户时代的历史中。

作者是历史学者,却像一位导游似的,引领读者穿越四百年的路线图,发掘那些隐藏在在大历史褶皱中的细节,左右逢源,举重若轻。很多乍看去似稀松平常的物事,恰恰构成了后来深刻影响社会的某种文化的雏形,如幕府为了抑制地方藩主势力的发展,要求各地大名隔年到江户居住的所谓“参勤交代”制度,是今天上班族调往地方或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的“单身赴任”文化的前身。今天“三都”(即东京、大阪、京都)之间的文化差异,诸如“京都人细腻,大阪人贪婪,江户人浮夸”,或“京都之人多矜气,重土地;大阪之人多杀气,重财富;江户之人多客气,重官职”(均为江户时代学者广赖旭庄语)等说法,其实未尝不是德川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遗留。而在这种历史“细见”(日本专门详解历史文化细节的一类出版物)的过程

中,还对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及学界通识,做了一番正本清源:譬如关于德川时代是否“锁国”的问题,作者认为所谓“锁国”说,是“由欧洲人发明出来,又逐渐传回日本国内的”,是“一场历史的误会”。事实上,德川时代的日本不仅没有“锁国”,反而留下了四个窗口(松前藩、萨摩藩、对马藩和长崎),在通商的同时,维系与世界的交流:长崎设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社区“唐人屋敷”;知识人热衷学习荷兰语,从欧洲舶来的知识被称为“兰学”。其实,就连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的坐大,也与幕府这种对外的姿态不无关系。近松门左卫门写的一出净琉璃《国姓爷合战》,讲的就是郑成功的故事,至今仍仍是东京、大阪歌舞伎座的保留剧目。

当然,所有历史读本,本质上都是历史叙事,并不等于历史本身。但惟其如此,我们才需要在不同的视角间切换,以期“脑补”一部全方位的通史,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——这也是读史的主要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大人的日本史》不失为脑补的道具,或引子,而且是有趣的道具,有料的引子,可资校正、深化我们的日本观,从而增殖汉语思想。